

一篇短文让我看到了舆论的力量

□张经济

的两名看护员伸手向他们讨钱：“新年新岁的讨个吉利钱。”给10元钱嫌少，给20元才肯罢休。临到火葬场来车时，也要吉利钱，不给不开车，张口就要20元和一包香烟。到了火葬场，安排火化时间不仅要给钱，还要给香烟……两个小青年气愤地说：“死了人还要买路钱，不知这是什么规矩？”

送走他俩后，我立即陷入了沉思：人死了，还要再花一笔“买路钱”才能“上路”，这合理吗？这不是一种行业陋习？作为《无锡日报》的老通讯员，我觉得有必要向党报反映这一问题，希望通过舆论的力量，为净化社会风气尽一点力。我把这一想法向工会主席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支持。

于是，我以《修桥铺路一辈子 死后还缴买路钱》为题写成了稿子，送到《无锡日报》群工部。群工部的吴主任仔细看了这篇稿子，很感兴趣，为慎重起见，

他又打电话给我单位工会主席，对细节作了进一步核实。

第三天，这篇稿子就见报了。想不到，竟引起了轩然大波。先是某医院办公室主任到群工部要求在报上刊登稿件失实的声明。接着，民政局负责殡葬事务的同志和火葬场的有关领导也到群工部吵闹。因吴主任早就核対过事实，所以，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后来，民政局那位办公室的同志还和我成了好朋友。

这事儿还没完。大约一个星期后，《新华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接着，江苏省民政厅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打来电话，大意是他们看到了《新华日报》上的这篇稿件，感谢我为全省殡葬系统提供了一个好的反面教材，我们要以这件事为契机，要求全省殡葬系统以此为戒，加强学习教育，把坏事变好事。不久，我市民政局负责殡葬工作的那位同志打

来了诚恳认错的电话。

事情还在继续发酵。又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在读者来信版转载了《新华日报》上我的这篇稿子。不久，《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来电告诉我，我的那篇小文章在《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目刊登后，收到了各地来信大约140多封，都是痛斥殡葬歪风的。我单位工会也陆续接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表达了对殡葬行业不正之风的愤慨。

由此，江苏省建委聘请我为信息员。后来，我又成为中国建设工会《中国建设者》杂志的特约通讯员。

事后，我还得知，江苏省民政厅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行风大整肃。自此，无锡市民政局殡葬行业的“买路钱”歪风得到了根治。

真的没想到，我在《无锡日报》发表的一篇短文竟然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舆论的力量真的不可小觑。

我从漫画作者到漫画编辑

□王全大

我是改革开放初期走上漫画创作道路的，算起来已近四十个年头。在这条路上，我慢慢从一个初学者，成长为一名小有名气的漫画家，在全国漫画大赛中多次获奖，在中央及地方报刊发表了6000余幅漫画，出版画集40余部；还走出国门，在巴黎等地举办了画展。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无锡日报》密不可分。

我上世纪80年代初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当时在南长区委工作。我从小就喜欢美术，尤其喜欢漫画，改革开放初期又是漫画创作从禁锢到兴旺，迎来繁荣发展的黄金年代。记得当时画了一幅《量》而行的漫画，是讲怎样对待人才的，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画稿送到了无锡日报漫画编辑沈云天老师手中，他认真看了几遍，肯定了我的画作，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我根据沈老师的指点，改了几稿，终于在《无锡日报》上刊用，还被很多报刊转载了。之后，在沈老师的指导下，我的漫画创作一发不可收，包括《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内的全国几十家报刊上都有我的漫画作品刊登，其中《关局长审稿》还在全国漫画大赛中获一等奖。

由于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人对漫画还有误解，容易“对号入座”，给我和《无锡日报》的美术编辑带来了许多烦恼。我记得当时曾创作了一幅《不给压力不出水》的漫画，在全国漫画大赛中得了一等奖。这幅漫画主要是说有些干部不给压力就不给老百姓办事，不关心群众疾苦；上级给他压力了，才勉强作为。该漫画一在《无锡日报》刊发，个别人就开始“对号入座了”，对这幅画提出批评，刊发这幅漫画的周卓人老师为此受到了一些责难。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想到有的漫画家由于一幅漫画而受到批判，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几十年，心里就有些后怕，于是就想扔下画笔。后来在单位同事和领导的宽慰下，在周卓人老师的鼓励下，我还是没有丢下画笔，继续进行漫画创作，还写了一篇《我终究没有放下画笔》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刊登，并获得《新华日报》改革开放十周年征文比赛二等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入无锡日报社工作，并在《江南晚报》和《华东旅游报》开辟了漫画专版——“江南漫画”和“旅途幽默”，由一名漫画作者变成了这两个专版的编辑。我向全国各地的漫画作者约稿，向老漫画家约稿，还请无锡籍著名漫画家华君武题写了刊头。我和各地的漫画作者、爱好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刊用了大量好作品，其中有华君武、丁聪、方成等名家之作。我还尝试了一些漫画形式的创新，把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形式融入到漫画中，创作了许多水墨漫画；我将漫画与书法相结合，充分运用漫画的夸张和变形，汉字的象形和会意，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漫书”。我还把一些漫画爱好者的作品推荐给其他报刊，使他们的作品有了更多发表的机会。

可以说，是《无锡日报》领我走上了漫画创作之路。在那个漫画繁荣兴盛的年代，我在这条路上奋勇前行，不断探索，力求创新。《无锡日报》陪伴我走过了人生中一段最为珍贵、难忘的金色年华，让我的艺术人生丰富多姿，精彩纷呈。

爱上写稿引来“好运”眷顾

□徐森宝

1989年9月14日，《无锡日报》在副刊版头一回刊登了我的微型小说《大桥下面》，从此《无锡日报》带给我诸多“好运”。

其时，我在江南航运公司货运船队的拖轮上工作，单位领导知道我有写作爱好后，鼓励我多写身边人、身边事，捕捉平凡职工不平凡的闪光点，积极向《无锡日报》投稿。不久我采写了单位节能标兵、市劳模、公司某货运船队拖轮轮机长的节能事迹。这位轮机长所在船队长年往返无锡——上海。轮机长与船长积多年经验，摸索出一套有效的节能措施：开航前用轻油、停航前用轻油、正常航运用重油，船队航行上海地段遇到涨潮、落潮选择“最佳航线、最佳航速”。不久稿件在《无锡日报》刊登，一时成为公司上下“热点”，由此把公司100多艘货运、客运拖轮的节能增效推向高潮。

1991年公司创办《江南航运报》，我有幸被公司领导“看中”聘为业余记者。《江南航运报》4开小报每月一期，当时公司有货运、客运、供应站、修理厂等10多个二级单位，有5000多名员工。

身为《江南航运报》的业余记者，我写船员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还利用船队到港或轮休在家的时间到公司下属部门采访、写稿，在《江南航运报》上展现了一个个充满“正能量”的“小人物”风采，同时择优向《无锡日报》投稿。

1993年初，公司领导为加强《江南航运报》宣传力度，将我调从船队调到公司船舶修理厂轮机车间当钳工。不跑船了，工作更稳定了，写稿、采访更方便。每月一期的《江南航运报》我每期至少刊发两篇文章，大多三篇、四篇，并常有稿件散见于《无锡日报》，被工友戏称为“土记者”。

当时修理厂承接高速公路广告牌制作、安装业务。安装广告牌“主力”是电工，需现场排线、接线；电工须有钳工、电焊工、辅助工配合。为了提高电工的技能，厂部专门为电工班开了技术培训班，电工班11名电工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个个成为手持多证的“多面手”。到高速公路安装广告牌既是电工亦是钳工、电焊工，样样“有一手”，且保质保量。我将电工班事迹写了篇《小小机电班 企业挑大梁》的稿件，不久在《无锡日报》见报，引起公司上下轰动，公司所属二级单位纷纷上门取经。

1993年6月，我到公司教育科采访写稿，教育科姓陈的女科长关切地问我：“小徐是啥学历？”“我初中毕业。”“初中不行，去上个业余中专吧？”“怎么上？”“你写份报告交给我，无锡市总工会会有成人业余中专……”经陈科长推荐，我通过考试1993年9月1日入学，学的是企业管理，1996年7月1日毕业。拿到毕业证书不久，又一个“好运”等着我，经修理厂领导研究，将我调到厂办公室工作。从此向《无锡日报》投稿列入我工作的一部分，我成了名正言顺的“土记者”。

回顾30年投稿路，至今我已有关新闻、通讯、随笔等400多篇稿件被《无锡日报》刊用，曾连续10多年被评为《无锡日报》优秀通讯员。如今我已退休，与《无锡日报》天天见，常向《无锡日报》投稿，成了我平凡生活的乐趣。

当好“新闻观察员”

□陶浩明

2009年1月7日，《无锡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幸福歌声绕山飘》的报道。报道以我市映山湖歌队为载体，展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我，正是这篇报道的作者。同年1月22日，我还意外地收到了报社主编给我发来的新春贺信。这就是我和无锡日报故事的开始。

从此以后，我便不断给报社提供新闻线索，甚至达到了一发不可收的地步。十年来，我给报社及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了千余条新闻线索。十分荣幸的是，2013年，在无锡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十周年系列评选活动中，我被评为“十佳新闻观察员”。

近年来，我提出的很多问题，在党报的有力舆论监督下，都很快得到了整改。2012年9月5日，我发现锡城会友路两边的混合车道、人行道板以及两侧绿

化带上，全都被挂着“转让”字样的二手车所占据，甚至有“黄牛”搬来大小碎石，在道路上排成长线进行“圈地”……我随即拨打了党报热线，党报记者和交警部门取得了联系，这个久被市民诟病的会友路二手车市场，在交警部门的重拳出击下，终于撤出了会友路主道。10月11日，《无锡日报》在A4专版以《党报监督下，问题解决了》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地下人行通道，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7月，我发现锡城不少人行地道都存在墙板大量掉落的现象，人行地道的使用效率也相当低。我向报社反映了这个问题。报社记者收到我的新闻报料后，立即赶赴现场。在20天不到的时间内，《无锡日报》连续推出了三篇报道《地下人行通道少人行》《7条人行地道8月将大修》《7条人

行地道终于修好了》。党报的舆论监督推进了问题的解决，消除了城市的安全隐患。

2015年，我在县前街行走时发现，县前街与解放西路路口西南角的一根交通引导牌柱，原本有两面的引导牌只剩一面。而在太湖大道上交通引导牌锈蚀的情况比较多，太湖大道与通扬路口西南侧的一块文明交通引导牌锈蚀非常严重，大风一吹即有可能掉落。我当即拨打了110报警。随后，《部分文明出行引导牌成安全隐患》经《无锡日报》图文报道后，交警部门即刻将这些“隐患引导牌”在一个月内存改完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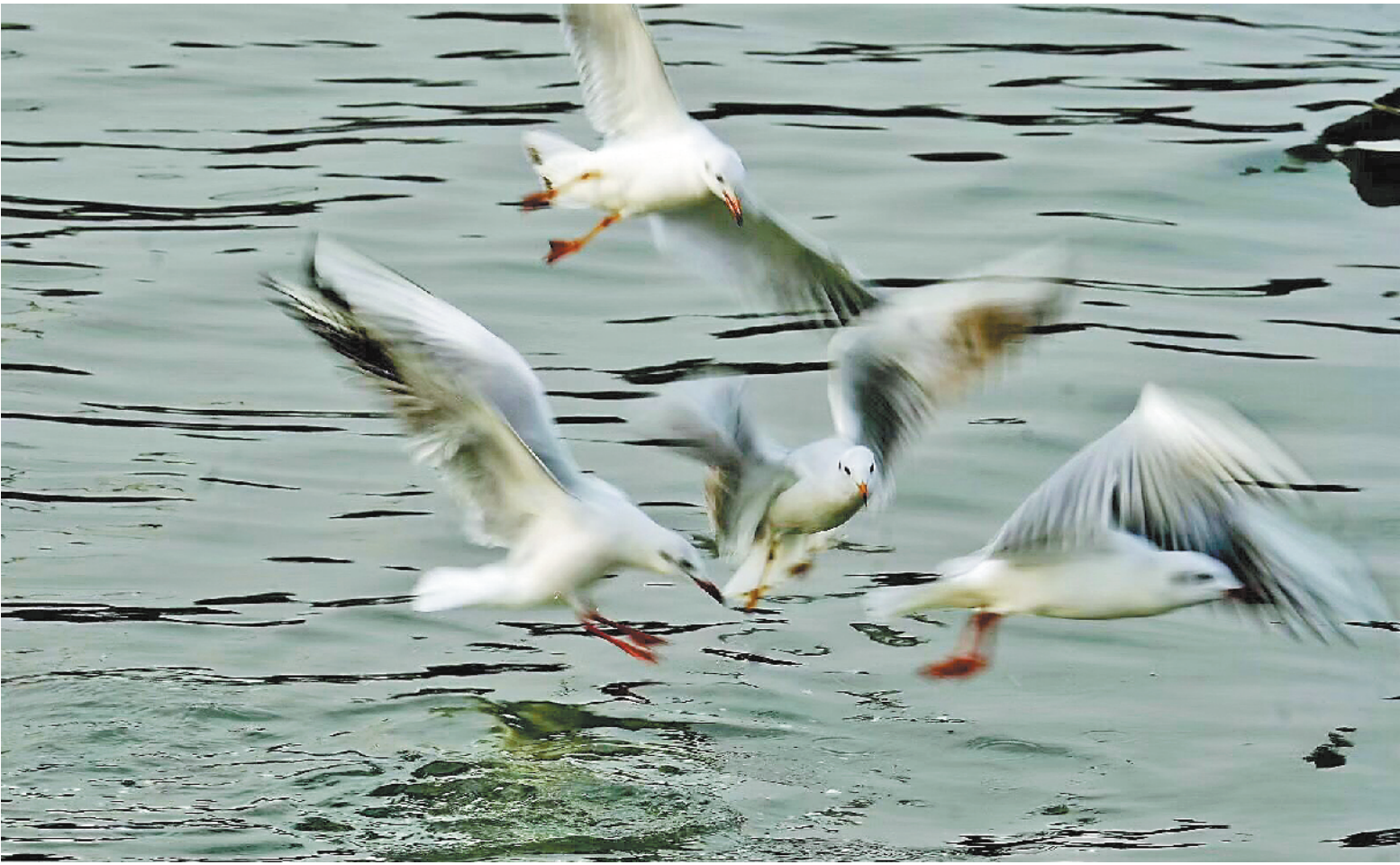
2017年5月，我抓拍了南下塘三月内两度“开膛破肚”的照片，报料南长街南下塘路段几度开挖，居民苦不堪言，刊登在《无锡日报》的《南下塘三月内两度“开膛破肚”》一文引起了有关部门重

视，编辑据此写的评论文章《杜绝“拉链马路”要定规矩》《对“拉链马路”说不》《建地下综合管廊消除“拉链马路”》还登上了《无锡日报》头版。

……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每天，我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到锡城的大街小巷走走看看，发现问题及时提出，还时不时回访这些地方，看看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我向党报和有关部门报料、反映的问题涉及道路、交通、民生、环保等多个方面，被《无锡日报》采用超1000余条，这些不和谐现象在党报的舆论监督下，都很快得到了整改。

齐心协力为城市文明作贡献，这是我和《无锡日报》的故事。守望故里，只因我对锡城爱得深沉。作为一名老党员，只要我的身体许可，我将会一直做下去。



翔
刘芳辉
摄

“小人物”是新闻写作的“富矿”

□熊 涛

1986年春夏时节，当时还在无锡市服装机械厂从事生产工作的我，经厂工会推荐参加了无锡日报新闻写作培训班，在培训班上发出我的第一篇新闻报道。33年过去了，我从小班组走进了办公室，从企业走进机关，从普通工人成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但我报道的对象始终没有离开过平民百姓、社区新闻，一辈子“结缘”小人物。

培训课都放在晚上上，由报社记者、编辑业余授课。记得有天晚上去报社途中，经过五爱广场旁的工农兵电影院，发现等候观影的观众一圈围着一圈，不知何故。喜欢“看热闹”的我随即停下自行车，扶着广场栏杆踏上单车书包架，目光越过了“人山人海”：原来，几位金发碧眼的外国朋友也在等待进场观看电影，那时的影院还没有休息厅，观众只能露天等候观影。改革开放初期，锡城很少见到外国人，群众里外三层，将这几个“稀罕”洋人团团围住仔细

“欣赏”。我当时就觉得，如此行为很不礼貌。有感而发，下课回家就写了篇见闻，并呼吁市民争做文明无锡人。很快，处女作见报了，这是我在市级党报发表的第一篇报道。惊喜之余，写作热情更加高涨，第二年无锡日报报庆时我即被评为优秀通讯员。

记得当时的版面栏目，有“世风小议”“班组天地”“兵头将尾”等，都很适合通讯员投稿，而报道对象也大多是街巷新闻、普通人物。上班时，我喜欢往车间跑，下班了就往菜市场和人多的地方钻，只为发现新闻线索。比如，吴桥桥堍的馄饨摊帮工阿姨因小青年无理取闹被烫伤，我寻访沿河商铺目击者，找当地派出所了解情况，写成报道发给《无锡日报》，为受害人伸张正义；一些企业的职工劳保用品质量低劣，我查找原因撰写言论，提醒企业负责人注意职工劳动保护和生产安全……许多年后，还有投递员对我说：“经常看到你的文章，老为我们弱势群体说话，谢谢

你！”在桃园新村门口摆摊的哑巴修鞋匠陈国兴，每次看到我都伸出大拇指，比划着点赞！

近年来，无锡日报迎来新的历史变革，新媒体、融媒体和社区新闻等版面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成为党报通讯员。无锡日报依靠群众办报的方针一直没有变。坚持群众办报让党报始终拥有稳定的读者群，拥有一支高素质的评报员队伍。33年来，本人由青年步入中年，由通讯员成长为特约评报员，由企业职工到机关干部，由业余写作到专职负责宣传工作，但宣传报道的目光从未离开群众一刻。

2017年立春的一天午后，我外出散步经过荣巷农贸市场，忽见原来一块空旷的场地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绿植，一名卖花郎正在和女顾客议价，但临时出门的女顾客没有带足现金。卖花郎说，你带了手机吗？微信支付也行啊！随即掏出手机，对着买花妇女的手